

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 对非洲政策评析*

孙 濛 奇 李 毓 博

内容提要 埃尔多安执政以来，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进取态势，这一态势尤其体现在土耳其对非洲政策上。或者说对非洲政策构成理解埃尔多安时代土耳其外交政策的重要维度。有鉴于此，本文通过结合土耳其国内形势及国际局势，系统梳理埃尔多安执政以来土耳其与非洲关系，综合分析土耳其对非洲政策的历史由来与现实成效，进而探讨土耳其对非洲政策的形成动因、战略意义及多重挑战。研究发现，土耳其对非洲政策具有较强的连贯性，取得显著成效，且蕴含浓厚的建构主义色彩。与非洲发展良好关系依然是土耳其未来外交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从长远来看，土耳其对非洲政策依然面临与其他域外大国发生利益冲撞的风险，也受到自身发展状况和非洲内部复杂政治经济关系的限制。

关键词 土耳其 埃尔多安政府 非洲政策 建构主义

作者简介 孙濛奇，杜伦大学政府与国际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李毓博，杜伦大学政府与国际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随着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与多极化格局不断深化，新兴大国、区域强国与传统强国间围绕国际规范、经贸利益与地缘政治影响力的竞争逐渐加剧，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近年来，非洲国家因其巨大的市场潜力与年轻的人口结构优势，普遍展现出强大增长活力与潜力，加之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域外国家与非洲国家交往的意愿显著增强。作为重要新兴经济体与地缘政治中等强国，土耳其亦对扩张其在非洲的影响力表现出强烈兴趣。

土耳其将发展与非洲国家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之一，宣称与非洲大陆的关系是土耳其全方位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1998年，土耳其提出“向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黑海通史研究”（22JZD037）的阶段成果。

非洲开放”政策（Opening up to Africa Policy），在现任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上台执政后开始落实，土非关系由此进入蓬勃发展阶段。2023 年 5 月，埃尔多安借正发党再次赢得土耳其总统选举之机，抛出“土耳其世纪”愿景，^①意味着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埃尔多安时代”^②步入新阶段。有学者认为，以土耳其对非洲政策为核心的“安卡拉共识”将成为土非关系乃至促进非洲国家发展的新模式。甚至还有人认为，土耳其主导的“安卡拉模式”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繁荣。^③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土非关系予以高度关注，对土非关系发展的历史、结构与政策性因素进行了深度评析，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土耳其对非洲政策中的政治经济与战略因素^④、土耳其对非洲政策发展与历史^⑤、土非关系中的软实力因素^⑥等方面，并形成以下几个方面的观点：第一，土耳其对非战略是土耳其总体对外战略的有机组成；第二，土耳其对非政策与新奥斯曼主义密切联系；第三，

-
- ① 关于“土耳其世纪”愿景，参见梁钦、李毓博：《“土耳其世纪”国家战略愿景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24 年第 1 期，第 82—100 页。
- ② 关于埃尔多安时代的定性，参见李秉忠、涂斌：《埃尔多安时代土耳其外交的转型及其限度》，《西亚非洲》2018 年第 2 期，第 87—106 页。
- ③ Harry Clynch, “The Ankara Consensus: How Turkey is Boosting Influence in Rising Africa,” *Africa Business*, 6 February, 2024, <https://african.business/2024/02/politics/the-ankara-consensus-how-turkey-is-boosting-influence-in-rising-africa>, accessed March 1, 2024.
- ④ Federico Donelli, *Turkey in Africa: Turkey's Strategic Involve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21; Elem Tepeciklioglu and Ali Tepeciklioglu (eds.), *Turkey in Africa: A New Emerging Power?* Taylor & Francis, 2021; Mehmet Ozkan, “A New Actor or Passer-B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urkey's Engagement with Africa,”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14, No. 1, 2012, pp. 113–133; Tête Jean-Philippe Gunn, “The Presence of Turkey in Africa: Results and Perspectives,” *Stratejik ve Sosyal Araştırmalar Dergisi*, Vol. 4, No. 2, 2020, pp. 182–190.
- ⑤ Mehmet Özkan and Serhat Orakci, “Deciphering Turkey-Africa Summits: Scope, Content and Results,” *African Review*, Vol. 14, No. 1, 2022, pp. 48–67; Ahmet Kavas, *Osmanlı - Afrika İlişkileri*, Tasam Yayınları, 2006; Mehmet Ozkan, “What Drives Turkey's Involvement in Africa?”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 37, No. 126, 2010, pp. 533–540; Chigozie Enwere, “The Dimensions and Challenges of Turkey-Africa Political Relations: A Historical-Analytical Inquiry,” *Turkish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5, No. 1, 2014, pp. 57–72.
- ⑥ Tom Wheeler, “Ankara to Africa: Turkey's Outreach since 2005,”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8, No. 1, 2011, pp. 43–62; Birol Akgün and Mehmet Özkan, “Turkey's Entrance to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he Case of Turkish Maarif Foundation,” *Insight Turkey*, Vol. 22, No. 1, 2020, pp. 59–70; Eytül Arslan, “An Analysis of Turkey'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Africa and Its Inroads,” *Journal of African Foreign Affairs*, Vol. 8, No. 2, 2021, pp. 23–42.

土耳其对非战略属于长期持续性的政策投入。^① 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土非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20年以前的个案研究上,对2020年以来特别是2023年大选后的土耳其对非政策变化尚未给予充分关注。

有鉴于此,本文将结合土耳其内政与外交的最新变化,尝试从建构主义理论视角出发,^② 考察土耳其与非洲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建构性因素、历史流变与蕴含的潜在冲突,并在此基础上运用话语分析方法,考察土耳其对外政治话语与对非洲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探讨埃尔多安时期土耳其对非洲外交战略的组成要素与决定性力量。

土耳其与非洲的历史交往及“向非洲开放”政策

无论是在地缘认知还是外交政策中,土耳其通常将北非与撒哈拉以南非洲视为两个地区,前者被土耳其外交部作为“中东与北非地区”的一部分,而后者则作为单独的一个地区。^③ 这一范式是在土耳其与非洲国家长久交往历史中逐渐形成的。

土耳其与非洲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时期。整体而言,17世纪时,奥斯曼帝国曾控制北非及红海沿岸的大片区域,今天的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苏丹、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吉布提、索马里,甚至撒哈拉以南的尼日尔与乍得,都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奥斯曼帝国统治。尽管由于自身衰落,以及西方殖民活动的冲击,奥斯曼帝国对包括北非在内的边缘地区的控制逐渐减弱,但在名义上这些地区依然是奥斯曼帝国疆域的组成部分。

除直接统治外,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亦触及撒哈拉以南非洲部分地区。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北部区域,奥斯曼苏丹通过宗教、商业等方式间接施加

① 参见黄舍骄:《土耳其加强与非洲合作的动机及前景》,《亚非纵横》2008年第6期,第18—21页;张春:《土耳其对非洲战略与政策评析》,《西亚非洲》2011年第9期,第53—67页;张春:《土耳其对非洲地区的经贸合作》,《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2期,第86—99页;魏敏:《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土耳其的对非政策述评》,《中东研究》2020年第1期,第112—132页。

②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张国家间互动是可以被建构的,并且国家的实践活动会形成共有观念,这种共有观念又最终形成文化,而文化的本质则决定了行为体的身份、利益和行为。参见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③ T. C. Dışişleri Bakanlığı, Dış Politika – Bölgeler, <https://www.mfa.gov.tr/sub.tr.mfa?03af1e06-bd93-40cb-ae4f-2c4ac27672e7>, accessed March 2, 2024.

影响。1575 年，奥斯曼帝国与位于如今尼日利亚境内的卡奈姆—博尔努帝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并签订防务条约，规定奥斯曼帝国可以在该地区输送武器与教官。^① 苏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Sultan Abdülhamit II, 1824 – 1895）时期，奥斯曼苏丹还向当地的穆罕默德·西塔（Mohammad Shitta）授予“贝伊”（Bey）头衔与“迈吉德勋章”（Order of the Medjidi），以表彰其在拉各斯地区传播伊斯兰教的贡献。^② 奥斯曼帝国曾派伊玛目阿布·巴克尔·埃芬迪（Abu Bakr Efendi）前往南非，以增强帝国与当地穆斯林社群的联系，并促使当地穆斯林社群积极参与兴建汉志铁路（Hejaz railway）的集资活动。^③ 奥斯曼帝国还尝试帮助非洲国家抵御西方基督教入侵，阻止西班牙殖民者在北非扩张，并与葡萄牙在东非的殖民活动进行斗争。

总体来说，奥斯曼帝国缺乏对非洲的整体性认识，并且在其认知框架中充斥着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特别是 17—18 世纪以来，随着奥斯曼帝国逐渐推进现代化与西化改革，这种观念被内化并植根于奥斯曼帝国精英的世界观中，并部分地被土耳其共和国精英所继承。因此，在 19 世纪的奥斯曼帝国精英的认知中，普遍存在一种分裂的观点，即撒哈拉沙漠以北的马格里布地区被视为帝国边缘，而包括“非洲之角”在内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则被视为域外，充满陷阱与威胁，属于落后而野蛮的地区。^④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由于在外交政策上倾向于发展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长期忽视与非洲国家的关系。然而，随着非洲国家逐步实现独立与发展，土耳其与非洲国家开始建立和发展关系。1956 年土耳其在尼日利亚拉各斯开设第一个领事馆，1964 年在加纳开设第一个大使馆。1967 年 3 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访问土耳其，土耳其总统苏奈于 1969 年 12 月回访埃塞俄比亚，开启了土耳其与非洲国家间高层互访的先河。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期间，由于在塞浦路斯等问题上逐渐与西方国家产生分歧，土耳其开始积极寻求多样化的外交关系，其中就包括与非洲国家关系。1974 年，土耳其为津巴布韦提

① 张春：《土耳其对非洲战略与政策评析》，第 53—67 页。

② Selim Deringil, “Les Ottomans et le partage de l’Afrique, 1880 – 1900,” in Selim Deringil (ed.), *The Ottomans, The Turks and World Power Politics: A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itles and Terms in the Ottoman Empire*, Istanbul: Gorgias Press & The Isis Press, 2000, pp. 101 – 130.

③ Mehmet Ozkan, “What Drives Turkey’s Involvement in Africa?” pp. 533 – 540.

④ Federico Donelli, *Turkey in Africa: Turkey’s Strategic Involvement in Sub – Saharan Africa*, pp. 37 – 38.

供医疗援助，并于1978年与塞拉利昂签订经济与技术协定。^①这是土耳其开展对外援助的早期尝试。但总体而言，在冷战时期，土耳其并未形成系统性的对非洲战略或政策。

冷战结束后，基于对国际形势变化的研判与国内政治形势的转变，土耳其开始调整对非洲的观念并制定对非政策。1998年，时任外交部长伊斯梅尔·杰姆（Ismail Cem）制定了“向非洲开放”政策。这一政策以相互理解为基础，将政治与外交关系，经济关系，教育、社会和文化关系作为土耳其与非洲国家关系的三大支柱，旨在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加强土耳其与非洲国家在经济、商业、教育、文化、政治、外交、国防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增进与非洲国家的总体外交关系。^②

加强政治与外交关系的具体措施包括推动高层互访，建立外交部间磋商机制，增加土耳其与非洲国家外交官的派驻数量，加强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内的接触与合作，推动地区安全建设等。增进经济关系的举措包括向非洲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增强国际经济合作，签订经济、商业与科技合作协议，提供技术领域的短期培训，加入非洲开发银行，鼓励私营企业合作并建立相关的合作组织等。促进教育、社会和文化关系的措施包括通过文化纽带增强土耳其对非洲大陆的影响力，为非洲国家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名额，加强大学间的学术合作，创建学术交流项目，签署文化交流协议，举办文化活动等。^③

这一政策雄心勃勃，但是在实施过程中遇到诸多阻碍。一方面，由于多种因素，彼时土耳其国内在外交政策制定上存在重大分歧，土耳其本身也缺乏落实相关政策所需要的各项资源；^④另一方面，1999年伊兹密尔地震与2000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导致土耳其无暇他顾。^⑤因此，直到2002年正发党上台后，土耳其才开始真正着手落实这一政策规划。

① Ali Kaya, "How Turkey Built Ties with the African Continent over 23 Years," TRT World, No. 2, 2021, <https://www.trtworld.com/opinion/how-turkey-built-ties-with-the-african-continent-over-23-years-44625>, accessed March 2, 2024.

② Mehmet Özkan and Birol Akgün, "Turkey's Opening to Africa,"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48, No. 4, 2010, pp. 525-546.

③ T. C. Dışişleri Bakanlığı, *Afrika'ya Açılım Eylem Planı*, Baskı, Ankara, 1999.

④ Ziya Öniş, "Multiple Faces of the 'New' Turkish Foreign Policy: Underlying Dynamics and a Critique," *Insight Turkey*, Vol. 13, No. 1, 2011, p. 55.

⑤ Kamal Bayramzadeh, "Les Effets de l'Arrivée au Pouvoir de l'AKP sur la Politique Africaine de la Turquie," in Sébastien Santander (ed.), *L'Afrique, Nouveau Terrain de Jeu des Emergents*, Paris: Karthala, 2014, pp. 139-155.

从建构主义视角分析,土耳其长期忽视对非洲政策的根本原因是其对自身身份定位倾向欧洲化及西方化。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长期以凯末尔主义为意识形态主体,尽管政治伊斯兰、左翼运动等其他意识形态在不同时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凯末尔主义的基本方向。凯末尔主义范式下的现代化核心就是欧洲化,土耳其想要达到现代文明水平就必须欧洲化。因此,土耳其在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上都全面向欧洲靠拢,努力与“腐朽”“落后”的奥斯曼帝国划清界限,摆脱其“东方化”的历史包袱,并将伊斯兰教等与东方相关联的文化要素抛弃。^①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土耳其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对中东北非这些即使原属奥斯曼帝国的地区也缺乏关注,甚至表现出刻意的疏远和漠视,撒哈拉以南非洲由于在国际舞台上相对边缘的地位,更未能在土耳其外交策略中占据重要位置。

总体来看,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对非洲长期忽视,缺乏系统性的外交政策,但保持了较好关系,在非洲国家中也维持了良好的形象。20 世纪 90 年代起,面对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的局势,土耳其开始调整对非洲政策,“向非洲开放”政策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该政策也为日后埃尔多安政府的对非洲政策确立了基本框架。历史地看,奥斯曼时期与非洲的交往和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与非洲的关系,为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出台一系列对非洲政策奠定了基础。

正发党时期土耳其对非洲政策

2002 年,正发党赢得土耳其议会多数席位,成为执政党,但埃尔多安当时受到刑事犯罪指控,无法参选。直到 2003 年 3 月,土耳其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埃尔多安得以在补选中获得一个席位,并被任命为总理。自 2005 年开始,土耳其全面启动对非洲战略,并将 2005 年确立为“非洲年”。土耳其宣称其非洲政策建立在历史基础上,从双边、区域、大陆、全球四个维度实施,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人道主义四大支柱。^②因此,本文也将从这四大支柱出发分析土耳其对非洲政策。

(一) 政治领域

土耳其与非洲国家关系在政治与外交领域产生了积极变化,首先表现为双方

① 严天钦、石坚:《土耳其伊斯兰复兴与现代认同》,《宗教学研究》2012 年第 3 期,第 268—273 页。

② T. C. Dışişleri Bakanlığı, “Türkiye – Afrika İlişkileri,” <https://www.mfa.gov.tr/turkiye - afrika - iliskileri. tr. mfa>, accessed March 5, 2024.

互设大使馆的数量显著增长。2002 年,土耳其在非洲国家设立的大使馆只有 12 个,截至 2022 年底已增至 44 个;与之相对,非洲国家驻安卡拉大使馆的数量也从 2008 年的 10 个增至 38 个。^① 超过 200 名非洲外交官参加了土耳其外交部组织的各类国际培训项目,这些项目涵盖外交、档案、通信等领域。^②

2008 年 1 月,在非洲联盟第十次首脑会议上,土耳其正式成为非洲大陆战略伙伴国。同年 8 月,首届土耳其—非洲合作峰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成为土耳其与非洲国家稳定可持续合作的开端。这次会议后,双方建立了基于共同利益、长期稳定的平等伙伴关系,土耳其与非洲关系步入新时期。

2013 年,土耳其以域外成员身份加入非洲开发银行与非洲发展基金,并参加 2016 年非洲发展基金第 14 次增资讨论。这些举措加深了土耳其与非洲国家间的联系,推动了土耳其对非外交政策的深化。除此之外,在 2021 年 12 月举行的第三届土耳其—非洲伙伴关系峰会中,埃尔多安多次强调会议主题“加强伙伴关系,促进共同发展和繁荣”,并重申土耳其将持续与非洲国家合作,以推动双方关系全面提升。^③ 自 2009 年以来,土耳其已通过 44 笔交易,为非洲开发银行募集资金共计 13.37 亿里拉。^④

不仅如此,在埃尔多安的领导下,土耳其对非洲政策同样强调“非洲问题非洲解决”(African solutions for African problems)这一重要原则。^⑤ 同时,土耳其主张推动非洲国家崛起的进程,并致力于维护非洲各国及非洲大陆的稳定。土耳其前外长恰武什奥卢曾说:“我们与非洲国家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基础上全面、包容、平等的伙伴关系。我们认同非洲统一的愿景,并高度重视非盟《2063 年议程》以及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⑥ 在此过程中,土耳其也积极扮演调解者的角色,致力于帮助非洲国家解决争端,但很少直接介入。

① T. C. Dışişleri Bakanlığı, “Türkiye – Afrika İlişkileri,” <https://www.mfa.gov.tr/turkiye - afrika - iliskileri.tr.mfa>.

② Mevlüt Çavuşoğlu, “2018 Yılına Girerken Girişimci ve İnsani Dış Politikamız,” 2018 Mali Yılı Bütçe Tasarısı Vesilesiyle TBMM Genel Kuruluna Sunum, http://www.mfa.gov.tr/site_media/html/2018 - yilina - girerken - girisimci - ve - insani - dis - politikamiz.pdf, accessed March 5, 2024.

③ T. C. Dışişleri Bakanlığı, “Türkiye – Afrika İlişkileri,” <https://www.mfa.gov.tr/turkiye - afrika - iliskileri.tr.mfa>.

④ “Türkiye,”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Group, <https://www.afdb.org/en/countries/non - regional - member - countries/turkey>, accessed March 8, 2024.

⑤ T. C. Dışişleri Bakanlığı, “Türkiye – Afrika İlişkileri,” <https://www.mfa.gov.tr/turkiye - afrika - iliskileri.tr.mfa>.

⑥ Mevlüt Çavuşoğlu, “The Africa We Strive for is Possible in Unity and Solidarity,” Republic of Türkiy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5 May, 2023, <https://www.mfa.gov.tr/sayin - bakanimizin - yirmibes - mayis - afrika - gunu - makalesi.en.mfa>, accessed March 8, 2024.

与此同时，土耳其还积极参与非洲国家的国防建设，通过训练士兵、销售武器等方式，帮助非洲国家政府解决国内叛乱或消除恐怖主义威胁。2017 年开始，土耳其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建立了其规模最大的海外军事训练基地——索马里土耳其特遣部队司令部（Camp TURKSOM）。该基地计划训练 10000 名索马里士兵，并具备同时训练 1500 名士兵的能力。^① 土耳其宣称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的目的是帮助索马里培训军队，应对当地的恐怖分子。当然，设立海外军事基地也提升了土耳其军队在海外的投射能力。

除此之外，土耳其对非洲国家的军售也有所增加。与 2020 年相比，2021 年土耳其对非洲武器出口增加了 700% 以上，从 4100 万美元飙升至 3.28 亿美元，非洲也因此被认为很快会成为土耳其军事武器销售的第三大市场。^② 最为标志性的，土耳其国防工业近些年来的拳头产品，在纳卡冲突中大显风头的 Bayraktar TB2 无人机收获了大量关注和订单。2022 年 5 月，土耳其依合同向尼日尔交付了首批 6 架 TB2 无人机，^③ 摩洛哥军方也在同年 12 月宣布将其订单扩大到 12 架，^④ 这证明土耳其的军备日益受到非洲国家欢迎。除了 TB2 无人机之外，土耳其向非洲输出的武器装备还包括装甲运兵车（APC）、防雷反伏击车（MRAP）、自行多管火箭炮（MRL）和战斗机光电系统（EO）等。仅在 2020—2022 年，与土耳其达成军火交易的非洲国家就有 17 个，包括阿尔及利亚、布基纳法索、乍得、科特迪瓦、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利比亚、马里、摩洛哥、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塞内加尔、索马里、多哥和突尼斯。^⑤ 可见，土耳其在非洲国家的国防安全体系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

综合来看，土耳其与非洲国家的政治交往，不但落实了“向非洲开放”政策，还在军事领域取得突破。土耳其以军售为主的军事外交为其获取了重要经济与政治利益，仅无人机出口就赚取了可观的外汇，这些利益反作用于土耳其国内政治，成为彰显正发党政绩与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工具。

① “Turkey Sets up Largest Overseas Army Base in Somalia,” Al Jazeera, October 10, 2017,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7/10/1/turkey-sets-up-largest-overseas-army-base-in-somalia>, accessed March 8, 2024.

② Levent Kenez, “Statistics Show Turkey’s Arms Sales to Africa Boomed in 2021,” Nordic Monitoring, 10 December, 2021, <https://nordicmonitor.com/2021/12/statistics-show-turkeys-arms-sales-to-africa-boomed-in-2021/>, accessed September 12, 2023.

③ “Turkey’s Bayraktar TB2 Drone: Why African States are Buying Them,” BBC News, 25 August, 2022, <https://www.bbc.co.uk/news/world-africa-62485325>, accessed September 28, 2023.

④ “Oumaima Latrech, Morocco to Acquire 6 More Turkish Bayraktar TB2 Military Drones,” Morocco World News, 2 December, 2021, <https://www.moroccoworldnews.com/2021/12/345824/morocco-to-acquire-6-more-turkish-bayraktar-tb2-military-drones>, accessed September 28, 2023.

⑤ Data Source: SIPRI Arms Transfers Database.

(二) 经贸领域

土耳其在经贸领域加强与非洲合作关系也卓有成效,其行动呈现出地区性与国家性并重、国家主导与企业自主结合的特征。

在组织层面,土耳其人道主义救济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s and Humanitarian Relief, IHH)自1996年起便在非洲开展业务,除了协调土耳其对非洲人道主义事务外,还为土耳其企业进入非洲市场提供重要支持和平台。土耳其企业界的组织,包括土耳其商人和企业家联合会(Turkish Confederation of Businessmen and Industrialists, TUSKON)、土耳其出口商协会(Türkiye Exporters Assembly, TIM)、土耳其商会和商品交易所联盟(Union of Chambers and Commodity Exchanges of Turkey, TOBB)、伊兹密尔商会(Chamber of Commerce of Izmir, IZTO)等成为土耳其施行对非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①埃尔多安在2013年对加蓬、尼日尔和塞内加尔进行国事访问,随行的就包括三名土耳其大企业家。^②除了加强与非洲各国交往,面对作为整体的非洲,土耳其也积极打造交流平台,如土耳其与非盟合作,在2016—2023年组织了四届土耳其—非洲商业和经济论坛。土耳其方面高度重视,将这一平台作为加强双方交流合作的重要渠道,埃尔多安多次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

在这一系列政策活动下,土耳其与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在2003—2023年增长了8倍,达到407亿美元(1.1万亿土耳其里拉)。^③在消费品、文化产品、医药产品与建筑工程服务等多个领域,土耳其企业表现出色,不断扩大在非洲的市场份额。^④土耳其承包公司在非洲承接的业务增长迅速,截至2021年底,其在非洲承接工程总金额已经达到778亿美元。2003年以来,土耳其和28个非洲国家缔结了双边投资协定,并与38个非洲国家签署经贸合作协定,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双方经济联系,还推动了对非技术援助计划的实施。此外,土耳其在45个非洲国家设立了商业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双方经济交流与合作。^⑤土耳其对

① Gökhan Tekir, “Türkiye: Infrastructure Provider for Africa with Benevolence,” *İletişim ve Diplomasi*, No. 7, 2022, pp. 71–89.

② İbrahim Arslan and Soner Karagül, “Türkiye’nin Afrika Açılım Politikası: Tarihsel Arka Plan, Stratejik Ortaklık ve Geleceği,” *Uluslararası Hukuk ve Politika*, No. 35, 2013, pp. 21–55.

③ “Trade Volume between Türkiye, Africa Rises Eightfold to \$40.7B,” *Daily Sabah*, 20 September, 2023, <https://www.dailysabah.com/business/economy/trade-volume-between-turkiye-africa-rises-eightfold-to-407b>, accessed March 10, 2024.

④ Teresa Pinto, “Turkey’s Push for Influence in Africa Is Working,” GIS Report, 9 April, 2024, <https://www.gisreportsonline.com/r/turkey-influence-africa/>, accessed April 10, 2024.

⑤ T. C. Dışişleri Bakanlığı, “Türkiye – Afrika İlişkileri,” <https://www.mfa.gov.tr/turkiye-afrika-iliskileri.tr.mfa>.

非洲经济政策不仅增进了与非洲国家经贸合作，也有效促进了自身经济增长，为土耳其与非洲关系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

（三）教育、社会与文化

鉴于非洲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教育体系尚未健全，土耳其高度重视与非洲国家在教育领域合作。首先，土耳其通过不断增加奖学金，吸引非洲留学生选择土耳其的大学就读，^① 并依据国内的教育标准在非洲国家援建学校。通过此策略，土耳其能够有效应对语言和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从而为其在非洲增强影响力及软实力创造有利条件。^②

在土耳其同非洲国家的教育合作中，“居伦运动”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而正发党和“居伦运动”之间的分裂也显著影响了土耳其对非政策。自土耳其深化对非政策以来，其在非洲开设的许多学校均由“居伦运动”赞助或直接运营。^③ “居伦运动”自我界定为一种跨国运动，旨在通过教育推广其文化和宗教信仰。^④ 2003—2014 年，“居伦运动”积极参与在非洲大陆建立学校，并加强与当地教育部门的合作，旨在传播土耳其文化。然而，自 2016 年起，形势急转直下，“7·15”未遂政变后，埃尔多安将“居伦运动”列为恐怖组织，并呼吁非洲国家关闭“居伦运动”开设的学校及其附属机构。此后成立了土耳其马里夫基金会（Turkish Maarif Foundation），接管“居伦运动”在非洲的教育项目，进一步推广土耳其文化和教育理念。^⑤ 在土耳其对非外交中，文化和教育投资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2017 年，土耳其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成立尤努斯·埃姆雷（Yunus Emre Enstitüsü）文化中心，开设了土耳其语课程并举办多项展览活动，旨在增加南非公众对土耳其的认识。随后，马里夫基金会在南非、卢旺达等国开设学校，并与一些当地学校合作设立“马里夫土耳其研究中心”，进一步推进土耳其与南非关

① Têtê Jean – Philippe Gunn, “The Presence of Turkey in Africa: Results and Perspectives,” pp. 182 – 190.

② Chigozie Enwere, “The Dimensions and Challenges of Turkey – Africa Political Relations: A Historical – Analytical Inquiry,” pp. 57 – 72

③ Joshua D. Hendrick, *Gülen: The Ambiguous Politics of Market Islam in Turkey and the World*, NYU Press, 2013.

④ Nikos Christofis, Bahar Baser & Ahmet Erdi Öztürk, “The View from Next Door: Greek – Turkish Relations after the Coup Attempt in Turkey,”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54, No. 2, 2019, pp. 67 – 86.

⑤ Birol Akgün and Mehmet Özkan, “Turkey’s Entrance to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he Case of Turkish Maarif Foundation,” pp. 59 – 70.

系发展，同时有助于土耳其在非洲构建良好形象。^① 2023 年 1 月，土耳其时任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在南非的一次演讲中指出：“目前约有 6.1 万名非洲留学生正在土耳其接受教育，其中大多数获得土耳其提供的奖学金。”^② 这表明，土耳其在非洲的教育投入已经成为其文化外交的核心策略之一，也是其对非洲外交政策中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③ 土耳其总统夫人艾米娜·埃尔多安（Emine Erdoğan）赞扬尤努斯·埃姆雷文化中心在教授文学、文化和艺术方面的努力，认为这是加强国家间联系“最美好的工具”。她还说：“我们认为非洲是 21 世纪的新星。我们正在团结整个非洲大陆，使其达到应有的地位。土耳其驻非洲国家大使馆数量增加是双方关系深化的标志。”^④ 土耳其在非洲增设大使馆成为其重视发展对非关系的重要标志，也凸显了土耳其在非洲影响力上升的势头。

正如前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所述，土耳其对非洲外交策略不仅是现实政治的考量，而且深深根植于双方共享的历史、文化和人文关系，未来双方仍将以这些联系为基础，进一步深化彼此之间的合作，并长久地保持团结。^⑤ 这表明，土耳其不仅重视与非洲的政治和经济合作，也重视文化、历史和信仰的交流。通过这样的外交政策，土耳其不仅加强了与非洲合作，促进了双方关系发展，而且扩大了其在非洲的利益和影响力，提升了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

（四）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一向是土耳其外交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的重要话语与行动指南。自 2016 年起，土耳其更多地强调自身外交形象中良善的一面，并号称将坚持正义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以“积极进取的人道主义外交”作为名片和口号。

- ① Mevlüt Çavuşoğlu, “A Bright Future for Turkey – South Africa Cooperation,” Republic of Türkiy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10 January, 2023, <https://www.mfa.gov.tr/article-by-foreign-minister-cavusoglu-published-in-pretoria-news-and-iol-10-1-2023.en.mfa>, accessed October 8, 2023.
- ② Merve Aydoğan, “Türkiye Opens Research Center at South African University,” Anadolu Ajansı, 10 January, 2023, <https://www.aa.com.tr/en/africa/turkiye-opens-research-center-at-south-african-university/2784435>, accessed October 8, 2023.
- ③ Birol Akgün and Mehmet Özkan, “Turkey’s Entrance to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he Case of Turkish Maarif Foundation,” *Insight Turkey*, Vol. 22, No. 1, 2020, pp. 59 – 70.
- ④ Emine Erdoğan, “Emine Erdoğan, Abuja Yunus Emre Kültür Merkezi’nin açılışında konuştu,” TRT Haber, 20 October, 2021, <https://www.trthaber.com/haber/gundem/emine-erdogan-abuja-yunus-emre-kultur-merkezinin-acilisinda-konustu-618840.html>, accessed October 12, 2023.
- ⑤ Mevlüt Çavuşoğlu, “The Africa We Strive for is Possible in Unity and Solidarity,” Republic of Türkiy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5 May, 2023, <https://www.mfa.gov.tr/sayin-bakanimizin-yirmibes-mayis-afrika-gunu-makalesi.en.mfa>, accessed October 12, 2023.

土耳其积极进取的人道主义外交强调两大原则，即人道主义原则和行动主义原则，积极扩展对外援助，并自诩为全球最乐善好施的国家。^①

土耳其通过对外援助服务于本国外交政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85 年。这一时期，土耳其总理厄扎尔（Turgut Özal）通过土耳其国家计划组织（State Planning Organization）向部分非洲国家提供了 1000 万美元的经济援助。^② 他希望借助此塑造土耳其积极正面的国际形象，并促进土耳其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进而刺激土耳其经济增长。根据 1980—1992 年土耳其经济增长数据，此政策取得一定成效。^③ 此后，土耳其对外援助的范围逐步扩大，不再仅限于非洲国家，对外援助成为土耳其整体外交政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 2003 年正发党掌权后，土耳其政府开始优先考虑与对外援助相关的经济利益。在正发党的领导下，土耳其加大了经济战略的扩张力度，致力于开拓海外市场并追求经济利益。^④ 2011 年，当索马里遭受严重旱灾时，埃尔多安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索马里的眼泪》一文，详细阐述了土耳其向索马里提供的援助，并呼吁国际社会向索马里提供更多援助和支持。^⑤ 此举被认为是土耳其一方面彰显其人道主义外交，另一方为其在非洲进行经济扩张营造良好舆论。

土耳其还组建了专门负责领导协调对外援助事宜的土耳其合作与协调机构（Turkish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Agency, TIKA），该机构在非洲已设立 22 个项目协调办事处，旨在执行包括人道主义援助与技术援助在内的对外援助项目。根据《2022 年全球人道主义援助报告》显示，2021 年土耳其对外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总额约为 56 亿美元，相较于 2020 年减少约 23%。尽管显著降低，但是土耳其对外援助总额在全球范围内仍位列第二，仅次于美国。^⑥ 考虑到土耳其与美国之间在经济规模上的显著差异，这一数据进一步凸显了人道主义因素在土耳其外交中的重要性，以及土耳其政府贯彻执行这一政策的决心。

土耳其对外援助以医疗援助为主，具体包括为非洲国家提供医疗职业培训、

① 李秉忠：《土耳其外交的“人道主义”取向》，《现代国际关系》2020 年第 4 期，第 36—43 页。

② N. Birtok and H. A. Metin, *Türkiye' nin ikili dış yardımları: 1992 - 1996*, DPT Publication, Ankara, 1998, p. 1.

③ Donal McGettigan et al., "Turkey at the Crossroads: From Crisis Resolution to EU Accessi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No. 19, 2005, p. 5.

④ Kemal Kirişçi and Neslihan Kaptanoğlu, "The Politics of Trade and Turkish Foreign Polic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7, No. 5 2011, p. 719.

⑤ Recep Tayyip Erdogan, "The Tears of Somalia," *Foreign Policy*, 201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1/10/10/the-tears-of-somalia>, accessed October 15, 2023.

⑥ "Glob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Report 2022,"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2022, p. 13.

帮助建设医院与诊所，以及为非洲国家人民提供健康检查与免费手术等服务。^①值得一提的是，在 2020—2022 年全球新冠疫情中，土耳其积极贯彻人道主义外交政策，非洲则成为其医疗援助的主要受益地区。疫情期间，土耳其为 36 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在土耳其提供疫苗援助的 18 个国家中，有 11 个是非洲国家。^② 土耳其对非医疗援助紧密结合人道主义精神与诉求，使非洲民众对土耳其产生好感。土耳其也适时地在向非洲国家提供的医疗援助物资包装上印制了土耳其国旗与其他有象征意义的标志和图片，以及 13 世纪苏菲派神秘主义者鲁米的名言，从而突出并加强了土耳其的文化影响。^③ 这种结合了文化元素的医疗援助，成为疫情期间土耳其对非洲外交的重要名片之一。

土耳其对非洲政策的形成动因

土耳其对非洲政策从属于其整体外交战略，这体现了其试图跻身于世界强国行列的决心。自共和国成立以来，土耳其曾经对非洲关注严重不足。但从 2003 年起，土耳其在短短 20 年内已经形成了一套有体系、可持续的对非政策，这足以说明土耳其对非洲地区的重视。

如前文所述，土耳其在 1923 年后，虽然与非洲国家有所接触，但这些接触相当有限，真正开始制定对非洲可持续的外交政策应始于 21 世纪初。2003 年，埃尔多安以正发党领导人身份就任总理，土耳其对非外交政策迅速推进。从这一年起，土耳其开始全方位、多层次地与非洲国家接触。阿萨·伦德格伦认为，外交政策实际上是国家建设的工具。^④ 土耳其对非洲政策表明，它已经不再仅仅关注切身的地缘政治事务，而是将视野扩展到全球范围。由于曾经采取“孤立”政策，土耳其经历了一段国际孤立时期。因此，加强与非洲国家联系也有助于土耳其获得它们的外交支持，摆脱孤立状态。^⑤ 土耳其需要在非洲地区展示其影响

① Numan Hazar,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nd the Importance of Türkiye’s Policy of Outreach to the African Continent,” *Percep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8, No. 1, 2023, pp. 11 – 26.

② 18 个国家分别是：波黑、黑山、北马其顿、吉尔吉斯斯坦、利比亚、摩尔多瓦、乌兹别克斯坦、塞内加尔、突尼斯、土库曼斯坦、布基纳法索、刚果民主共和国、贝宁、尼日尔、索马里、坦桑尼亚、马里和塞拉利昂。

③ Yunus Turhan, “Turkish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During the COVID – 19 Pandemic: Focus on Africa,”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26, No. 3, 2024, pp. 327 – 345.

④ Asa Lundgren, *The Unwelcome Neighbour: Turkey’s Kurdish Policy*, I. B. Tauris, 2007, p. 18.

⑤ Elem Eyryce Tepeciklioglu, Francois Vreÿ and Bahar Baser “Introduction Turkey and Africa: Motivations, Challenges and Future Prospects,”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26, No. 18, 2023, pp. 1 – 6.

力，而非洲也需要更多的国际关注和支持，彼此需要使得双方关系趋于紧密，双方合作不断加强。

（一）土耳其对非洲政策是其国家身份调整的外化

建构主义认为，文化的本质决定了行为体的身份、利益和行为。土耳其对非洲政策的转变根本上源自土耳其所遭遇的深刻身份危机。国父凯末尔所确立的世俗主义的“脱亚入欧”路线始终无法与土耳其国情深度匹配，甚至可以说脱离了土耳其的实际国情，这导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百年来始终在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之间持续挣扎。^① 凯末尔主义将伊斯兰教他者化，导致以福利党、正义与发展党等一批伊斯兰主义为政治代表、以“安纳托利亚之虎”^② 为经济支撑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复兴。随着土耳其伊斯兰回潮的程度不断加深，原有的凯末尔主义西化身份认同逐渐减弱，埃尔多安及其正发党政府迫切需要加强伊斯兰主义、新奥斯曼主义的身份认同，利用对奥斯曼帝国历史记忆、“帝国荣光”的追忆，强化这一身份认同，进而稳固政权。随着埃尔多安确立总统制，土耳其对这种“帝国怀旧”情绪的利用变本加厉，借助这种情绪为其内政外交政策提供合法性依据。正是在这一时期，土耳其的外交焦点逐渐转向原奥斯曼帝国领域内的国家和地区，土耳其介入外部事务的广度和深度也进一步加强。^③ 这一需求在 2019 年土耳其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后变得愈发迫切。

土耳其对非洲政策的变化反映了这种国家身份认同的调整，身份需求在土耳其对非洲政策变化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土耳其对非洲政策变化还与国内政治伊斯兰化进程密切相关，在这一过程中夹杂着“新奥斯曼主义”要素与地缘政治要素。

（二）土耳其对非洲政策是非洲重要性日益上升的体现

土耳其对非洲大量的劳动力、储量丰富的资源能源等表现出浓厚兴趣，这是其投资非洲的重要动因，与其他域外大国的动因类似。非洲国家出生率普遍较高，拥有大量青壮年劳动人口，这些资源是土耳其和其他世界强国所需的。统计

① 唐志超：《身份危机与中东大变局》，《世界知识》2018 年第 24 期，第 27 页。

② 指土耳其中部内陆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城市及推动其增长的内陆伊斯兰资产阶级。

③ 曾向红、张峻溯：《“帝国怀旧”、地缘政治机会与土耳其外交的转折》，《外交评论》2022 年第 2 期，第 55—86 页。

数据显示,当前非洲年龄中位数约为 18.8 岁,是全球最年轻的大陆。^① 非洲广袤大陆上的丰富资源亦是其拥有的巨大优势之一。迄今为止,非洲拥有世界上约 30% 的矿产储量,8% 的天然气和 12% 的石油储量,黄金储量约占世界的 40%,铬矿和铂矿储量占比更是高达 90%。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70% 以上的居民依靠森林和林地维持生计。在大多数非洲国家,自然资本占到总财富的 30%—50%。^② 这些资源不仅对非洲国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也使得非洲成为全球资源配置和投资的重要地区。

土耳其领导人认为,土耳其与非洲国家之间存在着悠久的历史关系,这为其获取非洲国家信任和支持提供了重要基础。因此,土耳其十分重视与非洲国家发展长期合作关系。此外,经过与非洲各国的接触,土耳其意识到非洲国家在区域和国际机构中拥有许多代表名额,与非洲国家保持密切关系有助于提升其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③ 土耳其还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介入非洲事务,有利于提升其在非洲的影响力,因此对非洲外交变得更加积极主动和富有创造性。而从非洲的现实政治角度出发,非洲诸多国家面临包括分离主义与恐怖主义威胁在内的多层面国家安全困境,这些挑战为土耳其同相关国家进一步开展安全合作提供了机会,也有助于土耳其在国际舞台上扩大影响力

(三) 土耳其对非洲政策是其外交多元化的重要内容

在埃尔多安时代,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从立场相对独立转变为愈发积极主动。同时,土耳其的外交取向也从单一的西方、欧洲中心主义开始转为“向东看”,积极寻求与亚洲、非洲国家加强联系。这种转变不仅与区域乃至国际政治结构变化有关,而且受到土耳其对全球秩序及其在世界舞台上角色重新评估的影响。

建构主义强调历史和文化是塑造身份和利益的决定性因素。^④ 因此,使用建构主义理论来分析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外交政策,特别是其对非洲政策是适当的。这一理论框架不仅涵盖了土耳其对非洲的认知,还包括了土耳其对其他国

① “Median Age of the Population of Africa from 2000 to 2030,” Statista, 28 April, 2023,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226158/median-age-of-the-population-of-africa/>, accessed October 20, 2023.

② “Our Work in Africa,” United Nations, <https://www.unep.org/regions/africa/our-work-africa>, accessed October 20, 2023.

③ Sakariye Hussein, “What Drives Turkey’s Growing Influence in Africa?” Middle East Monitor, 6 June, 2020, <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20200606-what-drives-turkeys-growing-influence-in-africa/>, accessed October 25, 2023.

④ Yunus Turhan, “Turkey’s Foreign Policy to Africa: The Role of Leaders’ Identity in Shaping Policy,”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56, No. 6, 2020, p. 1337.

家非洲政策的评估及应对策略。此外，该框架也有助于理解非洲国家对土耳其政策的回应。可以说，土耳其对非洲战略的有效实施，与土耳其和部分非洲国家之间有共同宗教信仰和广泛历史联系密不可分。这种深层次联系为土耳其在非洲的政策提供了一定的文化和历史基础，从而增强了土耳其在非洲的影响力和非洲对土耳其的接受度。

埃尔多安多次强调，尽管土耳其人民和非洲人民在国情和语言上存在差异，但双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着共同的历史，这是他们作为伙伴、盟友和兄弟团结在一起的坚实基础。^① 此外，土耳其还批评西方对非洲的殖民历史，明确表示“非洲属于非洲人民”。^② 土耳其和非洲之间的历史联系及它们共同的宗教信仰，与西方殖民历史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因素对土耳其在非洲树立友好合作的国际形象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种话语表述不仅重申了双方共同的历史联系，而且加强了双方团结与合作，成为土耳其外交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成为土耳其外交多元化的重要内容。

（四）土耳其对非洲政策旨在积极应对国际格局变化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土耳其在全球舞台上采取了一种积极主动的外交策略。伴随着国家发展，在全球政治格局的调整与深化之中，土耳其已不满足于仅作为一个区域性强国，而是力图在地区事务中发挥主导性作用，乃至追求成为一个具备显著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土耳其外交部将这一时期的外交定义为“积极进取的人道主义外交”。

在 2023 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埃尔多安在其连任宣言中首次提出“土耳其世纪”（Century of Türkiye）愿景，涵盖了土耳其内政和外交的方方面面，展现了国家积极进取的精神，并明确表示土耳其志在成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大国。^③ 同年 8 月，在土耳其第 14 届大使会议开幕式上，新任外交部长哈坎·菲丹（Hakan Fidan）在其演讲中重申了土耳其对于国际现状的不满。他强调，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土耳其致力于改变当前不公正的国际秩

① Hüsamettin İnaç, *Türkiye'nin Kimlik Problemleri*, Ankara: Adres Yayınları, 2010, p. 143.

② Mevlüt Çavuşoğlu, “Turkey – Africa: Solidarity and Partnership,” Republic of Türkiy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14, https://www.mfa.gov.tr/turkey_africa_solidarity_and_partnership.en.mfa, accessed October 25, 2023.

③ Recep Tayyip Erdoğan, “The Century of Türkiye is a Comprehensive Roadmap that will Raise Our Country above the Level of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s,”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31 May, 2023, <https://www.tccb.gov.tr/en/news/542/147352/president-erdogan-attends-event-marking-the-161st-foundation-of-the-turkish-court-of-accounts>, accessed October 25, 2023.

序,旨在助力土耳其大国梦的实现。哈坎·菲丹表明,“土耳其世纪”愿景是希望构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以改变当下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体系。^①在土耳其大国民会议发言中,埃尔多安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战胜国所建立的政治和经济秩序正在全方位走向瓦解。”^②在2023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埃尔多安进一步批评现有的国际体系。他指出,当前联合国已经无法有效履行其保护全球安全的职责,反而变成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相互对抗的舞台。再结合俄乌冲突对联合国有效性的打击,埃尔多安声称,当今世界,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已不足以代表全球,呼吁联合国改革。^③这种观点在土耳其享有广泛的民意支持:根据民调数据,66.8%的受访者认为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将存在多个大国;同时有67.3%的受访者认为,中俄与美国的对抗将会进一步加剧。因此,多数人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56.6%的受访者认为国际团结合作不会继续增强,而58.8%的受访者认为国际组织的作用将会持续减弱。正如美国特朗普政府提出的“美国第一”口号所昭示的那样,54.7%的受访者认为未来各国将更加专注于国内政治,并强调本国利益。^④这些民调数据揭示了土耳其政府和公众对于全球政治格局变化的关注,以及对现有国际秩序的不满和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正是这种国际秩序观驱动土耳其寻求在国际舞台上扩大影响力,谋求加强与非洲国家合作,积极参与全球事务治理。

土耳其对非洲政策的战略意义与多重挑战

经过多年实践,土耳其对非洲政策的战略意义日益凸显。与此同时,土耳其对非洲政策的实施及其效果面临来自土耳其国内、非洲地区形势以及大国在非洲的竞争与合作等多重因素影响,面临诸多挑战。

-
- ① “Speech by H. E. Hakan Fidan,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Türkiye at the Opening Session of the 14th Ambassadors’ Conference, August 7, 2023, Ankara,” Republic of Türkiy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https://www.mfa.gov.tr/disisleri-bakani-sayin-hakan-fidan-in-14-buyukelciler-konferansi-acilis-inda-yaptigi-konusma--7-agustos-2023.en.mfa>, accessed November 6, 2023.
- ② *Türkiye Büyük Millet Meclisi Tutanak Dergisi*, 1’inci Birleşim, 1 Ekim 2020 Perşembe, <https://www.tbmm.gov.tr/tutanak/donem27/yil4/ham/b00101h.htm>, accessed November 6, 2023.
- ③ Recep Tayyip Erdoğan, “Türkiye – President Addresses General Debate, 78th Session,” United Nations, 19 September, 2023, <https://media.un.org/en/asset/k1k/k1k0p42nn1>, accessed November 6, 2023.
- ④ Özgür Ünlühisarcıklı, “Turkish Public Opinion on Foreign Policy and Security,”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United States, <https://www.gmfus.org/events/turkish-public-opinion-foreign-policy-and-security>, accessed November 13, 2023.

（一）土耳其对非洲政策的战略意义

土耳其对非洲政策是其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埃尔多安提出的“土耳其世纪”愿景具有重要意义。虽然非洲地区在全球维度上相对落后，但其人口红利、丰富的资源以及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理位置，均是土耳其对非洲政策的重要考量。土耳其积极发展同非洲国家关系，一方面旨在与非洲国家建立长期稳定的经济联系，以促进自身经济稳定增长；另一方面旨在寻求获得非洲国家的政治支持，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

1. 加强与非洲国家合作，构建良好的合作伙伴形象

土耳其通过其历史、文化和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在非洲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埃尔多安访问非洲国家，受到当地民众欢迎，他提出的口号“建设一个更公平的世界”（A Fairer World Is Possible）在各地张贴。^①如在索马里，当地居民视土耳其人为兄弟姐妹，并认为他们的到来主要是为了帮助当地发展，而不仅仅是追求自身利益。^②除此之外，土耳其的电视剧和戏剧表演等，在非洲部分国家也颇为流行且广受好评，这些文化产品激发了当地民众对奥斯曼帝国历史的兴趣。^③通过多维度的文化交流，土耳其在非洲树立了正面的国家形象，成为其软实力的重要表征。

土耳其在非洲逐步构建起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形象，这为其与非洲国家构建多维度、全方位的合作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土耳其对非洲政策也为其实现“土耳其世纪”愿景，并且谋求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和平公正的国际新秩序，提供了强有力的实例证明，从而增强了其国际影响力。当下，土耳其已通过自身努力在非洲赢得良好声誉，只要能继续维持这一声誉，它将在非洲大陆获得更多的经济和政治优势。^④因此，非洲成为助力实现“土耳其世纪”愿景的重要地区。

土耳其当下的非洲政策已经超越其既有的外交传统，成为埃尔多安时代土耳

① Ibrahim Bachir Abdoulaye and Zainul Abideen Jibril, “Turkey’s Multidimensional Strategy towards Africa,” SETA, October 2021, <https://www.setav.org/en/perspective-turkeys-multidimensional-strategy-towards-africa/>, accessed October 28, 2023.

② Burak Ünveren, “Turkey: Africa’s ‘Anti-colonial Benevolent Brother’,” Deutsche Welle, 2 April, 2021, <https://www.dw.com/en/turkey-seeks-to-strengthen-africa-relations-with-benevolence/a-56452857>, accessed October 28, 2023.

③ Kenan Toprak, “Turkey’s Return to Africa and Its Implications,”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25 June, 2021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turkeys-return-to-africa-and-its-implications/>, accessed October 31, 2023.

④ Julia Harte, “Turkey Shocks Africa,”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29, No. 4, 2012.

其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政策既背离了共和国早期的“国内和平，国外和平”的传统，也与此前主张的“零问题外交”存在出入，给土耳其的外交战略决策带来新挑战。当前，埃尔多安政府在处理外交问题时，不惮于使用包括军事干预在内的各种策略。自2010年以来，军事手段已成为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一个显著特征，这或许会使埃尔多安政府在外交决策中形成路径依赖，从而对其外交政策产生深远影响。

当下，土耳其对非洲政策在解决当地问题方面颇有成效。2020年调查数据显示，非洲人民最迫切希望政府解决的问题依次是就业困境、健康问题和道路建设。^① 土耳其通过实施如基础设施、工厂建设等各种项目，有效帮助非洲人民解决问题。此外，土耳其每年出资帮助非洲人民解决健康相关问题，特别在新冠疫情疫情期间，向非洲地区提供了大量疫苗、防护服等防疫用品。在教育方面，土耳其不仅为非洲学生提供奖学金，还积极参与当地高校建设。这些政策既符合非洲民众的期望，有助于非洲经济社会发展，也有效地增强了土耳其在非洲地区的影响力，并促进了土耳其与非洲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有利于建立稳固的合作伙伴关系。

2. 积极介入非洲地区事务，努力提升国际影响力

土耳其与非洲国家签订了多重合作协议，涵盖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这些协议，为土耳其介入非洲事务提供了正当性，譬如对利比亚内战的直接干预，但也引发极大争议。利比亚北濒地中海，南临广袤的撒哈拉沙漠，地理位置极具战略意义。鉴于利比亚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土耳其与该国长期进行经济合作，并予以军事支持。土耳其和利比亚签署了两项协议，旨在对东地中海黎凡特地区进行联合石油勘探作业，^② 这不仅为土耳其介入非洲地区事务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还使得土耳其能够获得非洲国家丰富的资源。利比亚对于土耳其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使土耳其能够扩大在北非的政治影响力，并进一步巩固它作为区域大国的地位。

随着利比亚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为了表达对利比亚伊斯兰主义的支持，埃尔多安明确表达土耳其的政治立场。土耳其议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法案授权土

① Gyimah - Boadi, Landry Signé and Josephine Appiah - Nyamekye Sanny, "US Foreign Policy toward Africa: An African Citizen Perspective", Brookings, 23 October, 2020,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us-foreign-policy-toward-africa-an-african-citizen-perspective/>, accessed November 3, 2023.

② "Erdogan: Turkey, Libya could conduct exploration in Mediterranean," Al Jazeera, 10 December, 2019, <https://www.aljazeera.com/economy/2019/12/10/erdogan-libya-could-conduct-exploration-in-mediterranean>, accessed November 3, 2023.

土耳其政府向利比亚部署军队，并强调此举旨在支持合法政府，预防人道主义悲剧发生，以及有效推动利比亚和平进程及国家转型。^①

此外，在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争端中，土耳其积极斡旋并宣称取得进展。这一方面对非洲地区稳定作出积极贡献，另一方面增强了土耳其作为国际调解者的形象。对此，土耳其声称其外交政策理念中的优先事项为：通过成功的外交与对话积极建设和平，维护安全，促进地区稳定、合作与互信。

土耳其参与非洲事务的举措，既为非洲地区发展带来机遇，也给该地区之前维持的均衡局面带来风险。截至 2022 年，土耳其已经与不少于 30 个非洲国家签订了安全和国家防务相关的协议。^② 这些协议的最初目的是帮助非洲国家培训相关人员，应对国内安全问题。然而，随着后续协议的补充，其涵盖范围已不局限于培训，而是逐渐扩展至其他领域。这些举措使得土耳其介入非洲国家事务趋于合理化，但同时增加了美国、法国等其他域外国家对土耳其在非洲活动的进一步关注。究其原因，这些国家担心土耳其与非洲关系持续发展会削弱它们在该地区的利益和影响力。尤其在土耳其直接干预利比亚内战后，这一趋势似乎已经成为可预见的现实，增加了土耳其与西方国家在非洲发生利益冲撞的可能性。

（二）土耳其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战

1. 土耳其自身状况会影响其对非洲政策

土耳其对非洲政策面临多重挑战。从非洲方面来说，土耳其需要应对的挑战是大多数非洲国家综合国力较弱、治理不善和政治不稳定等现实问题。^③ 从土耳其方面来说，近年来经济状况不佳可能会限制其在非洲开展更进一步行动。21 世纪以来，土耳其一跃成为世界第 16 大经济体，并被视为继金砖国家之后最有前途的新兴经济体之一。^④ 然而，不论是 2018 年的里拉危机，还是新冠疫情的冲击，都对土耳其经济造成巨大打击。截至 2022 年，土耳其经济规模已降至世界第 19 位。^⑤ 2023 年初大地震进一步加剧了土耳其的经济困境。据计算，地震

① Ahmed Al-Burai, "Turkey's Troops in Libya: What's Their Mission?" *Daily Sabah*, 13 January, 2020, <https://www.dailysabah.com/op-ed/2020/01/13/turkeys-troops-in-libya-whats-their-mission>, accessed November 8, 2023.

② Nebahat Tannirverdi Yaşar, "Unpacking Turkey's Security Footprint in Africa,"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No. 42, 2022, p. 5.

③ Anke Hoeffler, "Fragility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An Introduction,"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23, No. 3, 2019, pp. 1067–1072.

④ "Turkey: Economy and Investments," Qatar Embassy in Ankara – Turkey, 2020, <https://ankara.embassy.qa/en/turkey/economy-and-investments>, accessed November 12, 2023.

⑤ "Türkiye Overview," The World Bank, 2022, <https://www.worldbank.org/en/country/turkey/overview>, accessed November 12, 2023.

给土耳其造成的损失约相当于其 2021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4%，而恢复和重建成本预计会再增加一倍。^① 尽管当前土耳其经济已有所复苏，但由于对外贸易和对外援助在其外交政策中具有不可替代性，使得经济波动将直接影响土耳其对非洲外交政策，并同样影响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总体外交政策。

另一个挑战源自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目前，在非洲议题上，中东国家总体上可划分为两个集团：一个由土耳其和卡塔尔主导，另一个则以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为首的阿拉伯国家构成。自 2011 年“阿拉伯之春”以来，非洲和中东多个国家陷入混乱。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等国形成两个对立的集团，特别是在叙利亚内战中，这种对立关系进一步突显。此外，以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为首的阿拉伯国家于 2017 年对卡塔尔实施制裁，土耳其则选择支持卡塔尔，进一步加大了两个集团之间的对立。^② 这种地缘政治分歧不仅影响中东地区的稳定，也对土耳其对非洲政策和在国际舞台上的立场具有重要影响。

在非洲，苏丹前总统巴希尔曾是土耳其和卡塔尔的盟友，但他于 2019 年被逮捕并解除职务后，苏丹转而向阿拉伯国家靠拢。这一变化表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联盟可以在极大程度上制衡土耳其在非洲的现实存在。^③ 当下，土耳其外交政策日益自信、积极且强硬，这使得它在中东和非洲地区更深地卷入地区政治甚至军事冲突中，从而增加了非洲地区发展的不确定性。

随着中东和解之风渐盛，阿拉伯国家与土耳其、卡塔尔之间的关系正在逐步改善，逊尼派、什叶派等伊斯兰教支派也在此影响下逐渐放下成见而走向和解。因此，并不能排除未来中东地区整体走向合作共赢的可能。但是，近来巴以冲突趋于白热化，牵涉其中的中东政治实体不断增加，这又给地区和解潮添上了阴霾。这种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对土耳其对非洲政策以及其全球战略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经济问题、恐怖主义的影响，以及同中东国家在非洲的竞争，都是土耳其对非洲政策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为确保与非洲关系持续发展，土耳其以稳定经济为基础，针对先前对非教育合作中所遭遇的诸多问题进行系统性的修正，从而充分发挥其经济和软实力等方面的优势。最终，土耳其需要根据地缘政治和地区动态

① Ovunc Kutlu, “World Bank Revises up Turkish Growth Expectations for 2023, 2024,” Anadolu Ajansı, 6 June, 2023, <https://www.aa.com.tr/en/economy/world-bank-revises-up-turkish-growth-expectations-for-2023-2024/2915847>, accessed November 15, 2023.

② Yusuf Kenan Küçük, “Turkey – Africa Relations: Setbacks Amidst Advances,” Wilson Center, 21 February, 2020, <https://www.wilsoncenter.org/blog-post/turkey-africa-relations-setbacks-amidst-advances>, accessed November 15, 2023.

③ Spyros S. Sofos, “Navigating the Horn: Turkey’s Forays in East Africa,” PeaceRep: The Peace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Evidence Platform, 2022, p. 17.

的实际变化，重新评估与其他关键国家在非洲的竞争策略。

2. 英美等国对非洲政策会影响土耳其战略布局

目前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已展现出更大的国际抱负，而其在非洲的运筹将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域外大国形成复杂且多样的交互关系。当下，英国、美国等国都是非洲地区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土耳其对非洲政策必然会对这些国家产生一定影响，而且反过来也会影响这些国家对于土耳其的认识和外交策略。

相较土耳其而言，英国对非洲政策确实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在非洲去殖民化进程展开后，由于其漫长的殖民历史，英国在非洲的形象曾一度落入谷底。也恰好由于冷战时期的特殊环境，英国将维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以及参与欧洲共同体事务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在此期间非洲事务并未被赋予足够的重视。此外，随着英国加入欧盟，非洲在英国外交政策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降低。直到 1997 年，英国才重新调整对非洲政策，开始通过对外援助及承诺帮助非洲国家建立稳定的民主政治体制，逐步恢复并增强与非洲国家的信任与合作关系。这一转变标志着英国对非洲策略的重要调整，以及在本国外交政策中对非洲地位的重新评估。

从 2001 年开始，英国确立了对非政策的整体战略，其核心是通过为非洲国家提供一定经济支持，并结合其政治影响力，协助这些国家建立稳定民主政治体制。在实现这一方略的关键措施中，英国选择了削减债务，尝试通过此举促进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此外，鉴于非洲地区冲突频发，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英国决定参与非洲的维和任务，并强调其目标是促进民主政府的建立及维护非洲的人权。^① 尽管英国殖民帝国时期给非洲人留下了极其糟糕的历史印象，但由于殖民历史，英国文化也在非洲大陆广泛传播，英帝国的殖民遗产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非洲对英国文化的理解，这种情况客观上有利于英国同非洲国家发展新型关系。因此，尽管历史遗留问题复杂，但是英国通过积极的外交政策和合作措施，仍有可能重塑其在非洲的形象并强化双边关系。

随着英国决定脱离欧盟，其面临的一个重要困境便是全球影响力削弱。正因如此，英国再次将其外交焦点转向非洲。2017 年英国议员托比亚斯·埃尔伍德 (Tobias Ellwood) 在其演讲中强调非洲对英国具有重要意义，并提出双方需建立平等、互利互助的伙伴关系。^② 这一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指明了英国对非洲政策的

① 李鹏涛、翟珣：《英国工党政府的非洲政策浅析（1997—2010）》，《非洲研究》2013 年第 1 期，第 185 页。

② Tobias Ellwood, “UK Foreign Policy After Brexit: Engaging Africa,” Gov. UK, 20 April, 2017,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uk-foreign-policy-after-brexit-engaging-africa>, accessed November 17, 2023.

方向。此后，英国加强了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外交往来。截至 2020 年，英国对非洲进出口贸易仅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 2%，^① 但是双方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仍被视为战略性的。总体而言，当前英国和土耳其在非洲的政策没有直接矛盾，双方仍保留着合作余地。这种合作不仅符合双方利益，也是非洲国家所期望的。

长期以来，非洲并未占据美国外交战略的重要位置。然而，美国亦认可非洲对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美国对非洲政策同样侧重于提供援助、发展贸易关系、反恐和提供军事支持，也在文化层面对非洲国家进行渗透影响。一些非洲国家长期饱受战乱冲突和恐怖主义的困扰，这成为美国公司在非洲投资设厂的一大障碍。自 2010 年至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前，美非贸易额持续下降超过 50%。而且在这几十年间，美国总统仅两次访问非洲。^② 这反映出美国对非洲的关注程度相对较低。相较而言，拜登政府对非洲的外交政策表现出显著的重视。这表明在美国全球战略中，非洲的地位正在被重新评估和提升。这种转变可能预示着美国在全球战略中对非洲投入更多，并且参与更深。

非洲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这片大陆对于美国来说不仅是潜在的巨大劳动力市场，也是其战略利益的扩展区域。非洲仍然饱受安全问题困扰，为美国提供了进一步介入非洲事务的借口，也为美国的军工复合体提供了广阔的潜在市场。由于土耳其同样是重要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供应国，不可避免地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军售产生竞争甚至摩擦，首当其冲的就是土耳其方兴未艾的“无人机外交”。2021 年，土耳其 TB2 无人机在埃塞俄比亚战乱中发挥的作用，使得美国对土耳其在非洲的无人机出口表示担忧。当年 12 月，美国非洲之角特使杰弗里·费尔特曼在访问土耳其期间，曾以“威胁平民”为由，直接表达美国对土耳其向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出口无人机的不满。^③ 此外，土耳其尝试塑造的人道主义援助提供者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与欧美国家的定位重合，增加了双方在外交和战略上的摩擦。如果土耳其持续寻求加强在非洲的影响力，可能导致其与美国关系的进一步疏远。^④ 对于土耳其而言，这是一个需要全面权衡的问题，因为在其全球战略

① Matthew Ward, "The Geographical Pattern of UK Trade,"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16 December, 2021, p. 9.

② Rebecca Rattner, Bjorn Whitmore, "President Biden's Africa Policy," LSE, May 2021, p. 4.

③ Jonathan Spicer, Giulia Paravicini, Orhan Coskun, "U. S. Concerned over Turkey's Drone Sales to Conflict-hit Ethiopia," Reuters, 22 December, 2021,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frica/exclusive-us-concerned-over-turkeys-drone-sales-conflict-hit-ethiopia-2021-12-22>, accessed November 20, 2023.

④ Nosmot Gbadamosi, "Turkey Deepens Its Footprint in Africa," *Foreign Policy*, 22, December, 202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12/22/turkey-africa-erdogan-partnership-summit/>, accessed November 20, 2023.

布局中，与美国关系对土耳其而言具有重要影响。

在当前国际局势下，尽管土耳其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的疏远趋势，但并未出现直接的利益冲突。这种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土耳其、英国和美国均在努力塑造良好的合作形象，以获得非洲国家信任。因此，这些国家的外交策略主要基于政治、经济合作，而非军事手段。此外，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种背景下，建立多边合作和对话机制，特别是在非洲这样多元文化和政治环境中，不仅是战略上的需求，也是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土耳其、美国 and 英国等国的相互合作，有可能为非洲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也有助于这些国家在全球舞台上有效地管理和解决复杂的国际问题。

结 语

近年来，土耳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中东和巴尔干地区。尽管非洲相对较晚进入土耳其的外交版图，但土耳其很快认识到非洲在资源、经济、劳动力和政治支持等多个方面的战略价值。土耳其首先以自己独有的历史背景，以及非殖民主义国家的良好形象作为基础，率先构建起与非洲国家合作的基础。这种基于文化共鸣和历史理解的方式，使得土耳其能够在非洲赢得信任和支持。通过积极的外交努力和文化交流，土耳其强化了与非洲国家之间的联系。土耳其在非洲的援助和贸易投资不仅促进了自身经济发展，也加深了与非洲国家的经贸联系，为未来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迄今为止，土耳其对非洲政策已取得显著成效，国际影响力也随之提升。

然而，土耳其在非洲影响力扩大也打破了原有的平衡，特别是在其介入利比亚等国的事务后，非洲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面临新的挑战，土耳其也因此陷入复杂局面。此外，2023 年初大地震等事件对土耳其经济造成破坏性影响，对外援助和贸易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尽管如此，土耳其仍在追求“土耳其世纪”这一宏大目标，不断提升非洲在其外交中的地位。从长远来看，随着对非洲政策的逐渐深化，土耳其将会面临与美国等其他域外国家在非洲发生直接利益冲突的风险。如何量力而行发展对非关系，妥善管控风险，并审慎地发展与非洲国家的互惠互利关系，将是未来土耳其对非洲政策需要面临的重要挑战。

(责任编辑：陈雅慧)

Authors: Zhang Yanqiu,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Afric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enter,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en Yuan, Lecturer of School of National Security,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An Analysis on the Causes of Political Stability in Zimbabwe under Economic Sanctions

Zeng Zhu

Abstract: The “Fast Track” Land Reform Programs launched in 2000 strained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ZANU PF-led administration and Western countries, leading to economic sanctions that severely impacted Zimbabwe's economy and citizen well-being, thereby casting doubt on ZANU PF's governance legitimacy. Despite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crisis induced by sanctions which forced the ZANU PF to make significant adjustments in political system and share power, the rule of ZANU PF remained unshaken. Its ability to maintain political stability in cris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egitimacy of its power: ZANU PF is bolstered by its anti-imperialism and anti-colonialism liberation struggle's ideological legitimacy, performance legitimacy via patronage networks and the “Look East” policy, as well as the procedural legitimacy through the electoral process. Collectively, these factors mitigated the impact of sanctions on the ZANU PF's regime.

Keywords: Zimbabwe, economic sanctions, legitimacy of power, regime stability

Author: Zeng Zhu, Lecturer of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An Analysis of Turkish Erdogan Government's Policy towards Africa

Sun Mengqi and Li Yubo

Abstract: Since Erdogan assumed power, Turkey's foreign policy has exhibited an unprecedentedly proactive stance,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its Africa policy. This dimension of Turkey's foreign policy under Erdogan is crucial for understanding the overall approach. In view of this, by combining Turkey's domestic situ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urkey's relations with Africa

since Erdogan's administration,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origins and contemporary outcomes of Turkey's African policy, and discusses its motivation, strategic significance and multiple challenges. The evaluation reveals that Turkey's Africa policy is coherent and constructivist, which have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Maintaining strong relations with Africa remains a key component of Turkey's future foreign policy. However, in the long term, Turkey's Africa policy faces risks of conflicting interests with other external powers, and is constrained by its own development status and the complex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ynamics within Africa.

Keywords: Turkey, Erdogan government, policy towards Africa, constructivism

Authors: Sun Mengqi, PhD Candidate of School of Government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Durham University (Durham DH1 3HP); Li Yubo, Postgraduate Student of School of Government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Durham University (Durham DH1 3HP).

An Analysis of Soviet Union's Policy towards Africa during the Brezhnev Era

Hu Bo and Li Peiqi

Abstract: Traditionally, the African continent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sphere of influence of the Western European powers. After World War II, although the Soviet Union was once skeptical of African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s out of ideological dogma, it took a strategic interest in Africa along with the decline of colonial powers such as Britain, France, Portugal, and Belgium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African countries. During Brezhnev's rule, with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in order to occupy a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the Soviet Un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ts military assistance to Africa, strengthened its political ties with Marxist-Leninist political parties and armed groups in African countries, and even directly intervened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African countries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Nonetheless, in the Soviet Union's foreign policy at that time, the priority of relations with Africa was still relatively low, which was largely depended on the phased evolution of Soviet Union-West relations, becoming a chip in the game between them. This foreign policy based on opportunism and